

民 裕 府 九 史 圖 票 莊 錢 海 上

傅为群◎著



CHEQUE. NO. G 4188

The Ting Yuen Bank

SHANGHAI

Pay against
this cheque to
Dollars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民裕九府 上海錢莊票圖史

傅为群◎著



CHEQUE. NO. G 4188 Shanghai.

The Ting Yuen Bank
SHANGHAI

Pay against
this cheque to
Dollars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JU FU YU MIN SHANG HAI QIAN PAU ZHONG TU SHI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府裕民: 上海钱庄票图史 / 傅为群编著. —上海:
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2.7
ISBN 7-80622-655-9

I . 九... II . 傅... III . ①钱庄—经济史—上海市
—明清时代—图集②钱庄—银行券—上海市—明清时代
—图集 IV . F832.751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619 号

九府裕民—上海钱庄票图史

编 著	☐ 傅为群
责任编辑	☐ 完颜绍元
技术编辑	☐ 张伟群
装帧设计	☐ 东 升
出版发行	☐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
地 址	☐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.ewen.cc
经 销	☐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印 刷	☐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版 次	☐ 2002 年 7 月第一版
印 次	☐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开 本	☐ 889 × 1194 1/24
印 张	☐ 6.5
印 数	☐ 1-3000
书 号	☐ ISBN 7-80622-655-9/G · 132
定 价	☐ 55.00

目录

MULU

■ 序一	汪庆正	3
■ 序二	夏泓宁	4
■ 前言	上海钱庄与钱庄票	5
■ 一	上海钱业文献、实物萃录	13
■ 二	信票、汇票、庄票——钱庄“墨书”的钞票	34
■ 三	铜元票——小钱庄的“洋印新版”纸币	49
■ 四	代价券——钱庄发行的临时辅币	85
■ 五	划条、支票、本票——钱庄的票据	104
■ 六	钱业·公估局·宝银	137
■ 七	有钱庄、商号墨印的银元	141
■ 附录	上海钱庄名录（1776—1949年）	145
■ 后记		153

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历史文物丛刊(1)



傅为群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。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和博物馆研究陈列工作。1997年策划推出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、中国金币总公司和北京中国钱币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《上海历史货币汇展》。著有《方圆中的雅趣——怎样集币》、《图说中国钱币》。参与编著出版的书有：《钱币学纲要》、《百年证券典藏》、《20世纪初中国印象》、《老上海货币》、《图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》等。现为《中国历代货币大系》编委、上海市钱币学会理事。

序

《九府裕民——上海钱庄票图史》的出版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和征集钱庄文物的成果。

在银行出现之前，钱庄是我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。随着1843年上海开埠，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。上海钱庄在全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，上海钱庄签发或承兑的银票享有很高信誉，称为“上海寸头”，深受中外商客欢迎。在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，上海钱庄通过资金融通，对国内外贸易、工商业发展以至对整个社会经济、生活等诸方面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。1927年之后，随着本国银行业的崛起，钱庄渐居次位，但上海钱庄对民族工商业的关系，特别是与广大农村的联系仍然密切。1933年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，使由钱庄长期控制的上海“洋厘”市场逐渐消灭，上海钱庄由盛转衰。到四五十年代，上海钱庄逐渐走向衰亡。

有关上海钱庄的研究，以往比较囿于文字资料的编写，作为钱庄活动的重要媒介——票据，则鲜有披露，对各式庄票、实物的系统搜集研究更是阙如。《九府裕民——上海钱庄票图史》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。作者通过一百五十余件文物，用生动直观的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上海钱庄发生、发展、消亡的历史。该书将钱庄票——这一钱庄最重要的物证作为主体，以丰富的历史照片、碑刻、文献以及钱庄实物作为历史背景，使人们对钱庄的兴衰更具历史的纵深感。

作者对上海钱庄票的研究是下了一番工夫的，本书通过对各种钱庄票据的分类和定性，从而对上海大小钱庄的规模、等级有比较全面的介绍，自然也对上海钱庄的历史演变理出了一条明晰的发展脉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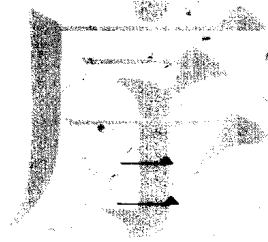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历史原因，上海钱庄实物留存甚少，作者通过不懈努力，经数年调查征集，使实物资料达到现在的规模，确为前所未有。我们相信，只要不断努力，此项工作今后仍可深入，并更趋完善。

用实物来印证历史，是对历史文化的修复，也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资料，这也是文博工作者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。

当历史跨入新的世纪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，《九府裕民——上海钱庄票图史》的出版，作为上海金融货币史研究的一部分，很有现实意义。故乐为序。

江晓正

2001年12月1日



傅为群先生新著《九府裕民——上海钱庄票图史》，即将出版问世，对从1942年起就在上海钱庄中当学徒的我来说，看到一幅幅图文并茂的画面，感到格外亲切和珍贵。

上海钱庄起源于何年？是学术讨论中很感兴趣的课题。我曾查阅过一些资料，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的一百多年中，由于商品经济逐步发展，随之带来各种货币之间的借、贷和交换，就伴随着出现初期的钱兑业。对上海钱庄的发生、发展，较普遍的有两种说法：一说认为上海早期的钱庄，是由绍兴人开设的煤炭店兼营货币存放而形成。曾任钱业公会会长多年的秦润卿先生曾著文称，钱庄“实始于旅沪绍人开设之煤炭肆，兼营小规模之存放业务，积之稍久，各方称便，业务日见发达，相继开设者日众，渐次形成钱庄之一专业。以区域言，则南市实为钱庄之摇篮”。另一说认为与沙船业和豆米业务有关，冯柳堂先生《钱庄由来之推测》（1943）一文称：“以余所见，上海之有钱庄业，必与沙船业及豆米业有密切之关系。……上海自有沙船业，而后有豆米业……盖豆米业之发展出，北货业随之而开张，款项之进出浩大，金融之调度频繁，钱庄业顺其自然，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。”上述两种说法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即出现钱庄的前提是商业及货币交换日益发展。钱庄的开设，又起到了促进商品流通，推动物资交流的积极作用。

《九府裕民——上海钱庄票图史》一书，刊印大量实物及文献资料，为学术界提供珍贵的第一手素材，不少幅图片引起我更多的重视与对往事的回忆。如“明崇祯王嘉锡号银票”，是留存于今极为宝贵的早期钱庄票证实物，据《徐光启集》记载，崇祯年间，上海名宦徐光启在京任官，于家乡、京城两地调度银两，也多用会票。这张由上海历史博物馆珍藏的空白银票，是推定上海何时出现钱庄的重要依据。

这部著作的其它多幅图票，会很自然地勾引起老上海人的一些回忆，如那幅座落于河南北路塘沽路口钱业会馆的老照片，它建于1819年，富有江南民间特色，雕刻精美，是一座很有内涵的历史建筑，但可惜在拓宽马路时已被拆除。另一幅位于宁波路的钱业公会照片，原建筑现仍完整保存，解放前我曾在这座钱业公会中的钱庄票据交换场工作过，是上海钱庄发展史中不可多得的建筑物。

上海的钱庄，从发生、发展至消亡，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，它对开埠前、后的上海经济，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。一部上海钱庄史，内涵浩瀚、涉及面广，时间跨度长。《九府裕民——上海钱庄票图史》的出版，将为研究上海钱庄史话的专家、学者，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翔实的历史资料。对“老上海”来说，则是茶余饭后、笑谈掌故的好题材。

2001年国庆于上海

前言

上海钱庄与钱庄票

一、钱铺·钱桩·钱庄——钱庄溯源与变迁

钱庄是中国旧式金融机构，历史悠久。在近代银行兴起之前，钱庄在社会经济中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。钱庄起源于钱铺，钱铺又称“钱肆”，最早见于明正德年间成书的陆垵《庚巳编》卷第二《洞箫记》，文中讲的是苏州人徐鏊遇仙女的故事。徐鏊经营的“解库中失金首饰，美人指令于城西黄牛坊钱肆中寻之，盗者以易钱若干去矣。”^[1]后徐鏊果然在钱肆中找到失窃的饰物。明嘉靖年间问世的《金瓶梅》一书，其中提到“钱铺”。该书第九十三回，冯金宝对陈敬济说：“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。”

钱铺的出现起源于货币兑换。货币兑换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，到明中后期，随着商品贸易的迅速发展，钱币种类更加繁杂，有制钱、私钱、白银，此三者之间比价差异大，变动多，兑换业更为发达，因此“钱铺”这类专营银钱兑换的金融组织即应运而生。钱铺又称“钱桌”、“钱摊”、“兑店”、“兑换银店”。明嘉靖八年（1529），私贩铜钱猖獗，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，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、钱铺等“私相结约，各闭钱市，以致物价翔踊。”^[2]可见当时货币兑换业的发达，竟有力量与封建王朝对抗，迫使政府放松禁令。明万历五年（1577）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，是为钱铺法定之始。^[3]明代江南地区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，前面说到苏州在明朝正德时已有钱铺称“钱肆”。至明万历年间，在它的黄金水道——吴淞江（苏州河）下游今上海松江县一带“广开兑店”^[4]，崇祯年间，松江名士陈继儒曾向知府建议，改私设兑店为“择殷实忠厚有身家之人，保结登名，设立兑钱官铺户”^[5]。这些金融机构成为很赚钱的行业。清康熙时，原太仓州的嘉定县（今属上海市），地方政府还勒石对当地“兑换银店”进行行业规范，如要求店主“明设铺面”，“连名互保”等^[6]。早期钱铺除货币兑换外，类似信用汇划等现象至迟在明后期也已经存在。据《云间据目抄》记载，嘉靖时华亭商人马某在北京经商赚得银钱后，即经人接洽在徐阶官肆中换得“会票若券者持归”，付与松江徐氏家人兑现银钱。稍后崇祯年间，上海名宦徐光启在京任官，于家乡、京城两地调度银两，也多用“会票”^[7]。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张“明崇祯王锡嘉号”空白银票。此票系薄皮纸木刻蓝色水印，票面作牌形，框高22.5厘米，宽24厘米。此票已烂残，但字迹尚可辨认：“号今到纸现付计银×两×钱，（两）面言定约至×月兑还不致（以）后无凭立此合同各存一纸为（照）崇祯×年×月×日王锡嘉票”。此票原为双联，现仅一联，但左边骑缝处有直书“合同信票”字样。所谓“合同信票”（又称“会票”），实际上相当存款的收据。但应当是可以转手流通的。兑付时两纸相合（骑缝处）同则兑付。“信票”，所谓信者，信之于人，信用也；信之于物，信物也；信之与章，印信也；信之于票，信票也。是

言必信、行必果的遵诺守信的书面保证。后来有的钞票取名信用券，表示奉行立票总须信的原则。这是至今国内发现最早的信票实物。票面计银，则称“银票”，若计钱，则称“钱票”。它是近代钞票的雏形。此票由上海郭若愚先生捐赠，他是从一本碑帖的封面里页上揭下的。这是一张未经填写使用过的银票，后来不知为什么原因被作为废纸用来装裱碑帖，衬在封面的锦缎里页。从装裱碑帖的式样看，有江苏地区，尤其是上海地区的特色。因此，这枚崇祯银票当时是在上海地区流行的^[8]。

从钱铺发展到钱庄，其间有称“钱桩”的。据胡觉民《苏州钱庄史料杂缀》记载：苏州的钱庄最初称“钱桩”。因用制钱时期以千文为一贯，钱铺一般将三百或五百贯砌成一堆，名为“钱堆”。桩的堆砌形式为马鞍式和方桩等几种，马鞍式桩上锐下广，顶上第一层为一贯，第二层二贯，第三层三贯，以后逐层递加，如底层是二十四贯，则一桩是三百贯，两桩相连，便成为马鞍型；方桩则是一层十贯，五十层的一桩便为五百贯。把银锭向钱铺兑钱，只要看到顶层和底层的贯数，就可知道一桩的贯数。无用更加点算了。因此，钱铺子就被称为“钱桩店”。有关钱庄铺面形式，在清光绪年间上海发行的《点石斋画报》中多处可看到。一般在柜台里靠墙钉有放钱的壁架，铜钱成堆砌成马鞍型。可见这已成为一种行业习惯。清咸丰年间，政府为推行钞票即有规定，钱兑店在柜上堆放铜钱，以备持钞券者随时兑换。“钱桩”后来改为“钱庄”的原因是，当时钱桩店的牌号，都简单地仅冠店主姓氏，为“×记钱桩”，后同姓的钱桩渐多，彼此之间对外很难区别，并且认为“桩”字的意义不能说明其业务性质。因而才改用后来的不易雷同的牌号，并把“桩”改为“庄”字，字书上说“五达为康，六达为庄”，“庄”字具有信用交易、四通八达之意，比“桩”字贴切。另有一种解释，认为“庄”字有“做东”、“做庄”之意，光绪年间葛元煦著《沪游杂记》，其中《钱庄赋》有“作输赢也，即庄也，开庄者庄也，即东家也”之语，可见当时开钱庄利润很高，但风险也很大，如同赌博。钱庄至少在明末已经出现，现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代绘画《南都繁会图卷》中有“钱庄”店招，店招上绘有银元宝及铜钱各一枚，表明主要从事银钱兑换。官方文献中最早出现“钱庄”一词是在乾隆十年（1745）正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称：“但铺户奸良不一，应飭各州县查明该处钱庄若干，钱铺若干，造册^[9]”。

中国钱庄以长江中下游为基地，江浙一带为中心，上海是龙头。有关上海钱庄的起源，据近代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先生回忆，他听老一辈传说，约在乾隆初年，其时有浙江绍兴煤炭商人在南市老城厢开设炭栈，时以栈中余款兑换银钱，并放款于邻近店铺及北洋船帮，获利甚巨。后来，他把副业当成正业，专营兑换放款业务，成为钱庄业的鼻祖^[10]。其实，在此之前除上海地区的松江、嘉定已出现兑店、钱铺外，南市已有钱摊、钱铺存在^[11]。“上海南市向为豆麦业群聚地带。因豆米生意兴旺。交易上之需求。必需有一种居间调剂之金融机关。于是有钱庄起而代之。另外，我国币制向极紊乱，习用银两成色各地不一，值格又复早晚不同，非有专业为说算，授受之间实非易事。欲图便利此种兑算起见，似乎不得不有钱庄”^[12]。如前所述，从钱铺到钱庄，其发展演变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推动。上海地处南北航运中心，自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开海禁，到雍乾之际，上海南市十六浦一带已是帆樯如林，贸易兴盛。随着商业的繁荣，钱庄这一在今天看来属于旧式的金融业终于在百业中脱颖而出，成为“百业之首”。原存上海内园嘉庆二年《钱业承办祭业各庄名单碑》记载1776—1796年的上海钱庄已有106家，名列前茅的有石源隆、冯信庄、

顾恒裕、三泰源、章恒源等。其时清廷对于金融机构的管理，仅限于北京一隅。故上海钱庄的设立，并不须向衙门申请注册，只须将资金额及营业范围开明，东家、掌柜署印，央同业中人作保，经钱业公所会议同意即可开业。1843年上海开埠后，商业日盛，外资银行纷纷建立，外国的洋行商家都可与之往来，而中国的商人却很少能向外国银行通融银钱。于是钱庄趁机密切与本国商人关系，并扩充营业范围，除了开发庄票还经营存放款、汇款、贴现。而兑换业务此时反而是附属的营业。更重要的是：此时的钱庄在中外贸易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——即以中间人信用保障的身份出现，因为内地商人和洋商之间的交易都需要买办作中间人，而中间人大多不过只是通晓外语而已，手头并没有多少资金，外商对这些没有经济保障的中间人也不敢相信，而钱庄作为金融机构有资金的保障，钱庄承担信用保障的方式是发行庄票，把庄票提供给可以信任的中间人，中间人向洋商办货时用庄票支付，洋行等庄票到期后，再向钱庄取款，而购货者的钱没有汇到钱庄时，钱庄先为之垫付。这样，中间人对钱庄负责，而钱庄对洋商负责，使中外贸易得以顺利进行。

1853年，江、浙、皖一带受太平天国起义冲击，一些官僚富豪逃往上海租界避难，“作为世外桃源。商人集则商市兴，绅富集则金融裕，而领袖商业之金融机关，乃次节开设矣。此为北市钱市发达之最初原因也”^[13]。而与此同时南市因受小刀会起义影响，商业逐渐凋零，钱庄亦倒闭不少。这样，南市许多钱庄逐渐迁移到北市，主要集中在“后马路”即靠近外滩属英租界的天津路、宁波路、北京路一带。以后在这一带钱庄、银行等金融机构麇集，时人称之为“东方华尔街”。据1937年调查该地区5条马路集中了全市60%以上的钱庄（银号）。如下：

九江路：银号：中源、仁德、顺兴、双盛；

北京路：银号：元丰、惠泰、永增合；钱庄：福泰；银炉：联牲、萃泰、生源、泰亨源、同牲、志庆、鼎泰；

宁波路：钱庄：五丰、永兴、永丰、安康、安裕、存德、同泰、同庆、承裕、和丰、恒祥、恒巽、恒赉、恒兴、益大、益康、寅泰、敦馥、福康、福源、慎源、廣裕、滋丰、衡九、衡通、鸿丰、宝大裕；银号：中实、永立、永馥、永丰、同和裕、信义、恒兴、恩庆永、泰和兴、汇昌、裕新、裕丰、永馥、永丰、同和裕、信义、恒兴、恩庆永、泰和兴、汇昌、裕新、裕丰、荣春、肇源、德盛昶；

天津路：钱庄：大德、大赉、元盛、生昶、同安、同春、均泰、怡大、信裕、益昌、振泰、顺康、惠丰、瑞昶、聚康、荣康、德昶、滋康、庆大、庆成、鼎康、鸿祥、宝丰、上海公估局；银号：元泰、天源、弘达、利通、和丰、保记、信源溢、泰丰、益亨、敦昌、华丰、源达、福安、福康、肇华、谦生、宝生；

河南路：钱庄：仁昶、同馥、志裕、志诚、信孚、信康、恒隆、益丰、义生、鸿胜、宝昶；银号：大昌成、源裕。

上海小刀会起义属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部分，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镇压。这一历史背景，在仅存的一张光绪二十五年上海市“春恒茂钱票”中留下踪影。钱票上方有外国洋枪队列队射击及肩负长矛逃跑的农民形象。钱票面值为“壹仟文整”，背面为“新增重修上海县城厢租界地理全图”，十分罕见。清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上海共有汇划庄（大钱庄）113家，其中南市36家，北市77家。光绪年间是上海钱庄发展的鼎盛时期，请看下表中

的数字:

上海钱庄数目历年统计简表

年 别		钱 庄 数 目		
旧 历	公 元	南 市	北 市	共 计
乾隆四十一年	1776 年	30		30
嘉庆元年	1796 年	76		76
光绪二年	1876 年	42	63	105
光绪三十三年	1907 年	36	77	113
宣统三年	1911 年	14	34	48
民国元年	1912 年	9	15	24
民国十六年	1927 年	11	24	35
民国二十一年	1932 年			72
民国二十四年	1935 年	3	51	54
民国三十二年	1943 年			193
民国三十四年	1945 年			229
民国三十八年	1949 年			79

从表中可看出,受辛亥革命打击,民国元年的上海钱庄数锐减,仅剩24家,后略有回升。至于日伪时期1943至1945年,上海钱庄空前“发达”,殊非常态。另外钱庄数字的统计较前放宽,凡“会员钱庄”均计算在内,而会员钱庄中包括一些资本额较小的钱庄。

在钱庄变迁中,曾经数次危机,如贴票风潮、橡皮风潮及辛亥革命。民国以来,钱业营业比较稳健,中间虽受五四风潮及信交风潮之影响,略有数家倒闭,整体均有回升。1932年,中日淞沪战争之后,钱庄为维护自身稳定市面起乃有“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”之设立。根据规定各庄所缴准备财产种类计分下列各种:1、立时可以变价之货物栈单;2、房地产之估价单,3、现金币或现金条,4、现元宝或现洋。并规定准备总额三千万元。这是钱庄的一大进步。该年南北两市汇划庄多至72家,这是继光绪年以来钱庄的又一次鼎盛期。按72家共计资本总额为九八规银1529万两,其中绍帮(绍兴籍)经理庄务者35家,共有资本银730万两;宁帮(宁波籍)经理庄务者17家,共有资本银392万

两。其余苏帮（苏州籍）经理8家，共有资本银158万两；洞庭山帮经理7家，共有资本银145万两，镇江帮经理者3家，共有资本银62万两。通州帮经理一家，计资本银30万两，湖北帮经理者一家，计资本银12万两。^[14]从以上统计看：绍宁两帮在当时上海钱业中，从家数看，占全体会员总数的72%，从资本看，占全体会员资本总额的73.4%。由于银行业的兴起，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。1933年，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后，钱庄在银两银元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，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，钱庄更形困难。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钱业又重新燃起发展的希望。1947年10月16日由上海、南京两地钱业发起在南京介寿堂举行“中华民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”成立大会。但不久，随着内战的爆发，希望破灭，由于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导致经济崩溃，钱庄更是每况愈下，仅能苟延残喘。上海解放后，于1952年底将尚在营业的28家钱庄并入了公私合营银行。

二、“入园”与“未入园”——钱庄的等级

上海钱庄行业的总公所在老城隍庙的东园，又称“内园”，原属邑庙豫园的一部分。早在二百多年前由钱业购下作为“公所”，地址在今豫园路168—170号。据《上海县续志》记载：“钱业肇始于乾隆年间（1736—1795），而园实构于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，因钱业历任修葺之费，故即设公所于此。租界辟后，北市钱业兴，凡关于南北市公共事件恒于此会议，遂以此为总公所。”分公所则南北市各有一所，南市设在施家弄，北市设于文监师路（今塘沽路）。当时钱庄业务上南北略有不同；北市以丝茶交易为主；南市以花米交易为主。故当时银拆南北市各开。民国二年（1913）以后，北市钱庄势力超越南市各庄，银拆始于斯时统一。民国八年（1919）又成立了钱业公会，地址在上海英租界宁波路隆庆里。至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新建大厦落成。

上海钱庄按其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，可分为汇划庄和一般钱庄两大类。汇划庄称大同行，即大钱庄，共组汇划总会作为共同清算机关。加入汇划总会的名汇划庄，因加入钱业公会，其前身为“内园”，故又称“入园钱庄”；一般钱庄没有资格入会，称“未入园”，或称小同行，其中又分元、亨、利、贞四个等级。现按钱庄等级及营业范围分述如下^[15]：

（一）汇划庄 汇划庄所营业务，为存款、放款、汇兑、贴现等。各户进出的数目甚大，每庄营业额最高达一千余万两，最小的亦三四百万两。这是钱业中的领袖，所出的票据，俱可在汇划总会内轧算。汇划庄中有本帮、绍兴帮、宁波帮、苏州帮（洞庭山帮）、镇江帮五派。

（二）元字庄 元字庄即所谓挑打钱庄。戴嵩庐《生意经》说：“按数十年前，通行者推制钱，需要颇繁，而又笨重，商家用款，即有此种钱庄，饬司装担，挑担分送，遂以‘挑担钱庄’名。今所谓‘挑打钱庄’者，实‘挑担钱庄’之误。”这种钱庄，较汇划庄略小，所营业务种类相仿，只数目较小。有牌面较好的，亦加入钱业公会。则所出票据，亦可直接至汇划庄总会轧算。否则，只好转托汇划庄去代办了。

（三）亨字庄 即所谓“关门挑打”庄。戴嵩庐《生意经》说：“按汇划庄与挑打，对于每日银洋进出，互相收解，每至傍晚，解银则用元宝，解洋则用银币，必须于每日清楚，不能存欠过夜。惟此项钱庄，因范围较狭，无力收

解现款，则于每日往来收解，大都转托汇划庄或上等挑打庄代为收理。而自己则关门吃饭。故每至傍晚，汇划庄与挑打庄，银洋往来忙碌异常，独此种钱庄，早已关门睡觉矣，‘关门挑打’，其此之谓欤？”这种钱庄，较挑打庄更小，存放款项及汇兑，贴现虽俱有进出交易，但顾客更少，营业范围甚为狭小。

（四）利字庄 这种钱庄，并不经营存放款项，只以兑换银洋、银角、铜元为主要营业，惟以整数进出为限，专为零星兑换的贞字庄即向利字庄整数的卖买，如他业之专为批发生意的店家一样，故又名“拆兑钱庄”。

（五）贞字庄 这种钱庄各马路均有。专营零星的银洋兑换，范围最小，虹口一带，有兼营外国货币兑换的庄家。并有兼买烟纸的，故又名“烟纸钱庄”或“现兑钱庄”。庄数甚多，有烟兑业公会之组织，设事务所于三马路。

旧上海又有钱兑业。钱兑业是介于钱业与烟兑业之间的组织，专以兑换各国货币及经营公债证券现金为惟一营业。“此业者多系精明干练之辈，且须熟谙外语，俾与外人交易，又以便与金融界接近关系，故该业类皆分布于四川路一带，即俗呼为‘老其昌’（‘其昌’为上海早期洋行，‘老其昌’即与外人做生意的人），总计大小不下20余家”^[16]。1936年，“未入园”钱庄组织了“钱兑业公会”，地址在武昌路同仁里，同年9月迁至北京路清远里50号办公。旧时元、亨、利、贞等庄一律加入会员，由公会废除原有等级，另按各会员资本额及业务范围，编为福、禄、寿三种，计全市福字庄21家，禄字庄4家，寿字庄32家，在这57家小同行钱庄中包括银号（如三泰银号）或银公司（如集成银公司、泰和兴银公司）等。抗战期间，这些小钱庄大都从事金钞及证券炒卖，业务空前“发达”。抗战胜利后，延至1947年底，钱兑业行号及公会被国民政府金融管理局全部取缔。

三、从“墨书的钞票”到“洋印新版”——上海钱庄票

钱庄票即钱庄所发行的有价票据，大约有以下数种：

（一）庄票 发行兑换券性质的庄票是钱庄首要业务。钱庄按寄存户存钱（银）填发存款收据，不记名，认票不认人，可流通市面。上海的庄票多为直式，票面仅直书文字三行。中间一行记载金额，右旁庄票号及印章，左旁记日期及盖有庄号印章。上海南市曾有一家“元大亨钱庄开出庄票，甚至不盖庄章，庄名仍用笔书写”^[17]。说明过去钱庄只重信用，不重手续，这是庄票粗简的主要原因。庄票分为即期、远期。即期者系见票即付，远期者则须至票面载定之时日方能付款。远期票开始有五、十日、二十日之分，后钱业规定“远期至多以十日为限，不得再迟”。现存上海豫园的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上海县“送还遗失庄票酬银数目之规定”告示碑，这是上海最早有关庄票的官方文件。碑文规定“遗失票银千两，有人拾取送还，酬银十两，视银票多少增减”；又说到当年“钱庄生意或买卖豆、麦、花布，皆凭银票往来，或到期转换，或收划锡钱”。可见庄票用途很广。庄票一般商人又称“银票”。五口通商后，当时钱庄在中外贸易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而

庄票也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，庄票发行数量也越来越多了。1919年时有人估计上海钱庄庄票的发行达到17亿两左右。如以当年上海钱庄在全国占二分之一份额，那么这一年全国的庄票发行额将达到34亿两^[18]。因庄票均为银票，且面额较大一般未有不兑现者。据称“即当1911年橡皮风潮之时，凡属于公会之钱庄，虽已停业清理者，而所发出之庄票，莫不完全付清，固未尝有丝毫之拖欠也”^[19]。由于钱庄管理上的严格，兑付勾销后的废票极难从钱庄流出，这是目前遗留下来的庄票极其罕见的根本原因。

（二）汇票 汇票即钱庄对于委托汇款者所发行的支付汇款书，亦即收款人收取汇款的凭证。汇票有即期、注期及板期三种。即期汇票钱庄见票即付现款，无可延诿；注期汇票即于票面注明见票后迟若干日付款。照钱业公会营业规程，注明之后不得止付；板期汇票则载明付款日期于票面，到期付款，期前不得通融。上海钱庄的汇票大部分是三联的，一联为上根由出票人自存查对；第二联为正式汇票，交汇款人寄出；第三联为下根，由出票人直接寄外地付款庄，以便查对付款。上海钱庄多有坐根，即将整本汇票的坐根加盖骑缝章后先行整本寄出，以图方便。上海钱庄汇票也因当年收回销毁彻底，故留传极罕。近年来，只见光绪年河北博陵至上海顺号丝宝栈，并转沪北汇划钱庄承兑汇票数张，这些承兑的钱庄都为汇划钱庄，有“厚德庄”、“成泰庄”、“萃和源记庄”、“申公大庄”、“延康庄”等，地址都在“北市”或称“夷场（租界）”。

（三）铜元兑换券 民国以后，上海的一些钱庄自印并发行了部分铜元票，票面书“兑换券”三字。这种小票主要在“花界”盛行，除了开销车力外，也可以购买香烟等杂物。当时还闹过一个笑话，有位朱先生误将铜元20枚，当作20元的银行钞票，在北火车站强要买头等的去南京车票，卖票处不许，以致口角动武，后闹到警署，原来他误认铜元20枚之铜字为银字。当时有记者在报上调侃道，建议钱庄将“铜”字印得大些以免误人。这类铜元票现所发现不超过百种。图案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。票幅式样如银行纸币，彩色石印，所见品种极少重复。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张“德顺成庄”的“铜元念枚”钱票，正面主图为“财神”，背图“双狮”。发行时间为1916年即民国五年，这是目前发现此类铜元票中年份最早的。兑换券使用范围一般仅限市区，至30年代初被当局禁止流通。之后回笼彻底，现留传下来甚少。兑换券与银行钞票无异，性质同庄票，但也有区别：1. 兑换券之支付无一定期限，庄票则有五日期、十日期；2. 兑换券收回后仍可发出，庄票则付款后即销毁；3. 兑换券认票付款，不认执票人。庄票虽亦认票不认人付款，但必须有收款人盖章于背面或票背，以明来历；4. 兑换券不能挂失，庄票有时亦得挂失；5. 兑换券一般为横式，用五彩石印，图案有财神、仙女、屋宇、塔亭、火车、工厂等，面值较小，多见当铜元20枚。而庄票以银（两、元）票居多，票幅直式，用毛笔填写，较粗简。

（四）代价券 1939年，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上海市面铜元辅币奇缺，商店找零困难，在此背景下，上海商家纷纷自行印制代价券，以救燃眉。上海钱庄印发的代价券以1分、2分、5分小额为主。据卫聚贤《最近上海行使的辅币代价券》一书记载：“在民国十八年时（按：其实更早）因铜元缺乏，钱庄等有发行二十枚等铜元票，后被收回不用，兹次（指1939年）使用代价券时，该钱庄将旧日用过的铜元票，加盖印章，作一分、二分、五分之用。”今所见这种老票再用的代价券有“源丰恒”、“永盛昌裕记”、“瑞和烟号”（加入烟兑业公会，属小钱庄）等

数家。上海钱庄代价券从1939年始至第二年即废除，钱庄代价券与兑换券性质相同，但代价券更具有临时性，印制粗简，流通范围小并作为辅币性质等特点。

(五) 支票 支票亦称联票，由客户填发，与银行发行的支票相似。上海钱庄支票一般为二联，第一联是存根，第二联即支票。加入上海票据交换所的支票上都有“交换行庄”的编号。钱庄支票，有即期与远期两种。照票据法规定不能开付远期，但习惯上则沿用五日或十日期。立票人并可于票面记载掉换庄票字样，持票人可于到期前持向钱庄预换庄票，并流行市面。所见支票以抗战后为多，与银行支票已没有多大区别。如支票年份集中在1949年前后的，则有“国币”和“人民币”等货币名称。

(六) 本票 本票即庄票，可以流通，相当于现款。本票与支票最大的区别是：本票是钱庄开出的，而支票是由客户填写的。本票又称“保付支票”，领款人不受存户存款限止，责任由钱庄负之，故受者比较安心无虑。

注释：

- [1] 明陆粲《庚巳编》卷二《洞箫记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。据叶世昌《钱铺到钱庄的产生》（载《学术月刊》1990年第五期）一文考证，钱铺即钱肆，其出现以《庚巳编》最早。
- [2] 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一九一。
- [3] 《明神宗实录》卷六六。
- [4] 明范濂《云间据目抄》卷二。
- [5] 《陈眉公先生全集》卷五六《答方禹修大尊修郡志》。
- [6] 上海历史博物馆藏《嘉定县完银规则残碑》拓片。
- [7] 《徐光启集》卷一一《家书》。
- [8] 郭若愚《上海地区发现的崇祯钱票》：见《上海金融》增刊《钱币研究专辑》1993年第一辑。
- [9]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二三二。
- [10] 《上海钱庄史料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，第7页。
- [11] 据嘉庆二年八月《上海县为钱业晴雪堂房产谕示碑》记“据钱铺魏廷钧、吴沛思、孙衡如词称：上邑城皇庙创建西园之后，东园失理倾倒。……”见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256页。
- [12] 《上海金融中心之钱庄》见1933年《钱业月刊》第十二卷第二号。
- [13] 姚公鹤《上海闲话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印影本，第116页。
- [14] 秦润卿《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》见《钱业月报》第十八卷第四号，1947年10月15日出版。
- [15] 《最新上海金融论》第三章，1936年出版。
- [16] 《银行月报》第八卷第三号，第335页。
- [17] 《上海钱庄史料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，第543、557页。
- [18] 《上海钱庄史料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，第543、557页。
- [19] 朱彬元《货币银行学》，黎明书局1930年版，第277页。

上海钱业文献、实物萃录

上海钱庄历史悠久，而“钱业公所”作为钱业行会组织的出现，距今至少也有二百余年的确凿历史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上海曾开展全市文物普查工作，对上海钱业遗存的石刻资料作了拓片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其中有些石碑已毁或下落不明，想不到所存碑拓有一部分已成绝唱！一份光绪年间开设钱庄的“合同议墨”，反映出上海钱庄出现了“契约股份制”这种新的合伙组织形式。除清代上海钱业公所“内园”外，原上海南北钱业公所建筑均毁，惟有旧影尚存。而旧时钱庄内的陈设，如钱柜、帐桌、票据、印鉴等实物，确是当年钱庄营业的真实记录。



内园

原为上海邑庙豫园的一部分，早在二百余年前即由钱业购下作为“公所”。地址在今上海豫园内。